

16-04

何子洛阳

新史资料

第二辑

新史资料



14

3475/23

樂川文史資料

(第一輯)

198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樂川县委员会

目 录

前言	(1)
解放前栾川区政府机构沿革	崔天翰供稿 (4) 王占柱整理
党政处在嵩栾一带活动的片断回忆	段海山 (12)
抱犊寨——风景区——匪霸魔窟—— 革命纪念地	王占柱 (27)
李起凤与十大寇	段海山 (39)
周明甫被杀之谜	王占柱 (55)
略谈清末科举制度	聂洱舸 (58)
河南大学在潭头 及对我县教育、文化的影响	马洪恩 (61)
耕莘中学建校始末	孙福慧 常纯则 (64)
我县第一所中学—— 私立“七·七”中学	马洪恩 (71)
艺海生涯六十年	兰辑五 (75)
“重九事件”与“讨左运动”	孙福慧 常纯则 (93)
推行法西斯教育的蒋步天	孙福慧 常纯则 (97)
武陟中学迁陟陶湾简况	孙福慧 常纯则 (100)
伊尹耕莘古地	徐宣武 (101)

前 言

栾川地处伏牛山腹心，伊水源头。为（长）江（黄）河之域，界予、楚之交。自古以来为“冲、疲、繁、难”之所。

栾川历史悠久。地下出土文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聚居。据传：商代贤相伊尹即出生、躬耕于此。自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高迎祥、李自成等进据栾川深山，开银矿、集饥民壮大起义队伍；下嵩（县）伊（川）破洛阳、捣北京、覆明室之后，历年民变迭起。苦难深重的栾川山民，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迨至清末，革命军兴，栾川反清斗争风起云涌。王天纵（伊川人）、柴云升（栾川潭头人）等义军即曾以栾川的合峪杨（羊）山为根据地，屡挫清军。后参加张钫（伯英）的“秦陇复汉军”。为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出了历史贡献。辛亥革命以来，在今栾川县境内发生的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诸如讨袁、北伐、抗日救亡、中共地下斗争、学生运动、解放战争、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重大的武装、政治斗争，都反映了栾川人民反封建、反侵略、反压迫、求解放以及创造新生活、发展新文化的战斗历程。

另一方面，栾川“山高皇帝远”，自古以来土匪如毛，官匪不分，土豪恶棍，横行乡里。他们欺压人民、阻碍历史前进，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从反面教育着人民：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沧海桑田，历史转变的进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但从未进行过整理研究。一部分已经散失，一部分仅仅保留在一些老同志、当事人、知情人、有心人的传闻、记忆之中。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说过：“认识过去，明白现在，创造未来。”社会要发展，历史要前进，那就必须对往事作出深刻的思辨。因而已故周恩来总理早就倡导全国政协征集、整理、出版《文史资料》。近年来，全国政协也多次要求各地方政协“抢救文史资料”。

整理、研究文史资料，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拾遗补阙，供史志工作者研究、择用，以“存史资治”，弥补历史档案、地方史志之不足，提供乡土历史知识、汇集“桑梓文献”，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也是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栾川政协成立以来，在县委领导和上级政协的指导下，对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多次研究。对初步搜集到的一些资料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核实、研究、整理，汇编成《栾川文史资料第一辑》，刊梓问世。

《栾川文史资料第一辑》共选印政协委员和其他人士的文章十四篇，约五万六千余字。大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笔者的亲历、亲闻之事。包括武装、政治斗争、文化教育，人物史事，名胜遗闻等正、反两方面的资料。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力求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宗旨，以求实存真为准则，以服务于新时期党的总目标、总任务为

目的。观点上力求以唯物辩证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文字上力求既保持原貌、又通顺流畅，有可读性。但由于水平所限、经验缺乏、讹误阙失，在所难免，敬希识者教正。

在编选过程中，县史志总编室、县文联、县教育志编辑室等单位 and 有关同志都给予了大力协助，谨在此一并志谢！

政协秦川县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七月

解放前栾川区政权机构沿革

（崔天翰供稿，王占柱整理）

栾川处于西伏牛山腹心地区。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为“冲、疲、繁、难”之所。曾于宋崇宁三年建县，金贞元二年废县。后划为镇，属虢州卢氏县治。清乾隆时，曾设有朱阳巡检司栾川分司，群众称“文武衙门”。后又将朱阳巡检司迁驻栾川。下设地方、保正，负责调解民事纠纷，办理盗案，征收田赋。

民元后，改为栾川里。里办事机构称为“事务所”，设里长。栾川白鹿沟张福谦、七里坪杨先炳（人称杨三先儿，字广南）、杨培芳、栾川北街傅其伦、东街傅其瑞（字辑五）西街傅国栋（字干臣）等均先后充任里长。里长及其“事务所”，办理民事，实施政令，为文职衙门。武事，则另设民团总局，维持地方治安，捕案缉盗。总局设局长。七里坪杨培殿、栾川西街关兴邦、赤土店尤永清，大王庙李起凤（腾蛟）等先后任局长。里下设村长和民团分局，亦称“局子”，推行政令。“局子”的负责人称“分局长”，具体带兵的称“带家”。

当时军阀混战，捐重税苛，加以兵匪为患，民不聊生。兹分别略述如下：

（一）赋税：强迫人民一次缴纳二至三年田赋粮银（农业税），摊派柴、草、麸、料“兵差款”。地方又附加“枪支款”、“弹药款”、“应筹费”、“自治捐”、“富户

捐”等。

（二）兵灾：当时各派军阀混战，你来我往。栾川为东通嵩洛，西达陕南，北往灵、陕的要道，时有军队驻扎、退却、休养。他们一来，就抓伏拉差，派粮派饭四出扰民。有的军兵，还要群众每天三餐供应熟食（即送罐饭）。至少三至五日，多达月余之久。当时群众生活困难，食不果腹，还要给他们筹办好的饭食。他们认为“不好”，即打骂不休，摔碗踢罐，强迫到饭店买馍饭供应，搞得民怨沸腾。

（三）匪患：当时“土匪”如毛，山头林立。“土匪”大致可分四种：（1）农民为生计所迫揭竿而起，打富济贫，反抗压迫统治。（2）各地土豪劣绅为扩充势力，投靠军阀，走“当大官、受招安”道路，指使兵痞流氓，胁诱饥民，拉杆为匪。（3）官兵哗变为匪，又暗结官府，土匪打家劫舍，抢掠财物；官府则明剿暗助，坐地分赃，官匪不分。（4）外地“杆子”，窜入栾川，扰害地方，以上四种通称“刀客”。群众一夕数惊，“跑反”躲难，不胜其苦。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伊川县郭世法股匪千余人，驻栾川月余，每天搜山（群众叫‘抹坡’）绑票，不论贫富均受其害。贫者被胁迫为匪或作苦力，富者被绑架囚禁，飞刑吊打，割耳剜鼻，勒索“赎票”。匪众又到处奸淫妇女，焚烧房屋，人民所受灾难真是不堪言状。

一九三一年后，改里为区。栾川编为卢氏县第三区。办公机构称“区公所”。赤土店尤永清（湛然）为首任区长。庙子李树仁（位三）、陶湾任天长（子久）为区员。下设三镇五乡。即：伊源镇（陶湾）、有莘镇（栾川）、三乐镇（庙子）、宣化乡（三官庙）、公益乡（大王庙）、长太乡（赤土店）、伊川乡（老君堂柳树坑）、公安乡（庙子北

四)。镇、乡之下设有村、闾、邻等，各有长官。负责催讨粮款，办理地方行政。

设区后，将全区土地分为一、二、三等及岭头、山坡、清查勘丈，为征粮之据。不少劣绅当了勘丈员，借清丈土地勒索农民，或接受贿赂弄虚作假，转嫁负担。富户地多粮（赋）少，农民地少粮多。

早在民初，张福谦任栾川里长时赖驻军协助，修了西河至栾川约五里长的兴隆渠。西起西河荣湾潭，东至栾川牛王庙。可灌良田千亩。后因匪患频仍，农村破产，诸多损毁。建区后，由李天禄督率民工，重修此渠，得以通水灌田，群众赞为唯一“德政”。

李腾蛟任栾川民国总局局长后，为扩充势力，依仗内乡土皇帝别廷芳支持，组成十大连。为排除异己，称霸地方，先后将付国栋、杨先立（杨十五）常乐英等绅士枪杀，引起地方各派势力不满。常乐奎、李天佑、崔法三、李九经等十余人，乃密谋刺杀李腾蛟。

一九三二年十月，乘李腾蛟在栾川北街官家药铺打麻将，崔法三，李天佑行刺暗杀，未获成功。李腾蛟之弟李起志（道轩）自任区长，坐镇追缉凶手，并电邀内乡别廷芳派队前来弹压。凡涉嫌之人，均遭逮捕。在大队部（时称“大军帐”）设下法堂，火熬、烙铁，五刑具备，严刑审讯，惨不忍睹。东门外设下刑场，或枪决、或枭首，惨状骇人听闻。区长尤永清，区员任子久均自动离去。栾川大政，归于李腾蛟一家之手。故当时栾川有民谚云：“李爷一出，压倒四爷”。（四爷指栾川街傅、七里坪杨、赤土店尤、雷湾常）

后卢氏县政府派张协中来任区长。张慑于李腾蛟之权

势，无所施展，数月后，即行离去。后又派王俊杰前来任区长，亦不过傀儡而已。

任子久辞离区员职务后，联络当时一批青年，到陕州十一行政区专员欧阳珍处，状告李腾蛟种种罪行。欧阳珍乃派保安副司令凌悲潮，率队来柰，取缔十大连，改编为四个义勇壮丁队，由常志箴之弟常志愿任大队长。李起志自命之区长亦因而倒台。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柰川由第三区改为卢氏县第二区。区长仍由王俊杰担任。在此期间，王主持调查了全区人口，编组保甲。又选派青年到陕州和卢氏参加“师资训练班”。（实为训练联保主任。）期满后，由卢氏县政府分派各地任联保主任或保长。不久王俊杰它调，卫敬铭被委为二区区长。

卫敬铭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任职，李腾蛟图谋东山再起，唆使其心腹惯匪马老六，勾结“杆子”，拉起“刀客”，与嵩县蜜峪土匪憨玉瑞（老九）结为一伙，骚扰柰川地方。卫敬铭见柰川局面不堪收拾，坚请辞职。区长暂由区员张克宽代理。张代理区长，仅仅两月，李腾蛟从中作梗，制造事端。或绑架区所壮丁，或杀害命案，地方混乱，一日数警。张克宽多次电请卢氏县府派区长前来主政。卢氏县府乃派时在县府任科员的柰川雷湾人常乐莘回柰川任区长。常回柰川后，见此种情况，知难与李腾蛟抗衡，仅到职一日，即携带区公所公章，潜隐太和寨。张克宽两次函请，常乐莘终未下山视事。

柰川区公所群龙无首，混乱异常。任子久乃与联保主任常乐煦等，一面再次向欧阳珍密告李腾蛟，一面在常志愿家中聚会，计议接替区长。李腾蛟则与当晚唆使憨玉瑞匪部包围

栾川寨，高喊“交出任子久、李天禄（相阁）”！常志愿知为李腾蛟唆使，迫于其势，次日将李请至其家，托病辞去义勇大队长职务，请李担任。李故作谦让后，即应允任职。

李腾蛟接任大队长后，电请别廷芳派兵前来，赶走了憨玉瑤，又将加入憨部的马老六等股匪“收伏”。（本为李所派遣）

不久一些青年联保主任，又找到陕洲保安付司令 凌 悲潮，状告李腾蛟纵匪收匪，危害地方。凌悲潮自称：原为越南太子，因越南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隐匿名姓逃来中国。他开始企图从中调解，曾给李腾蛟写信略谓：“弟本越人，来与华人合作共济时艰，兄等桑梓情深，更应和衷共济……”。后又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向青年联保主任等表示要派大兵来栾剿李治罪。一面又暗示李腾蛟杀人灭迹。李闻讯后，连夜将其所纵，收之匪首马老六及卫青山等枪杀。并将所收之匪众七十余人集中于大清沟龙王庙一次枪杀。（实际死者四十余人）尸横遍野，血染沟渠。待凌悲潮到达栾川后，李以“剿匪”战果向其“请功”。凌乃召开大会，改任李为清乡大队长。这时内乡别廷芳也派团长刘茂亭、司令部副官张仲奇，营长解永成等带队来栾，助李“协剿土匪”。凌对李“好言抚慰”，李又赠凌重金骏马，栾川军政大权仍集于李腾蛟一身。凌回陕至卢氏时，又指令卢氏县长徐衍沂调任子久为三区（双槐树）区长，委常乐莘为卢氏县仓库主任。想以此解决矛盾。二区栾川区长一职李腾蛟乃推举三川分区区长雷敬典（文斋）担任。一九三八年二月雷敬典到职视事。不到两个月，常志愿，尤湛然等又活动卢氏县政府，委任在洛宁县任区长的七里坪人杨敏（绍唐）回栾川任二区区长。杨绍唐仗凭杨姓为栾川豪族，独断专行，引起各派绅士与下属不

满，互相倾轧，各自为政。杨乃将不驯顺的联保主任撤掉四名。（当时全区十一个联保处）呈请卢氏县府委任青年卫邦新、高维聪、李云祥、张克己分别担任庙子、老君堂、柳树坑、栾川、北凹等地的联保主任。李腾蛟见杨绍唐起用青年扶植势力，感到与己不利，又到处活动“倒杨”。他籍石宝沟尚某在新打院墙内种植鸦片一事，指使人密告到卢氏县府，将种植人逮捕。保、甲长、联保主任连坐。杨绍唐区长也以“失察渎职”罪名被撤职。卢氏县府复派四区区长郭孝芸（香峰）接任二区区长。

郭孝芸对栾川情况略有所知，辞职未准，只好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来栾履任。他多方维持，谨小慎微，在区内设立调解委员会。请各方士绅担任委员。凡涉棘手之事，一概推诿，必办政事，则约请诸豪绅共议，唯李腾蛟“马首是瞻”。勉强维持一年，即两次呈请他调。卢氏县府无奈准其所请，又调任子久回栾川任区长。

当时卢氏县长黄迪栋是个“好好先生”，为卢氏当地豪绅所左右，对县政无能为力。国民党推行所谓“宪政”，成立了参议会，也为土豪劣绅所把持。曾有人在县参议会门口贴对联云：“张匡当议长老而不死休张狂，刘濂充副座少法无能莫流连”。春节时又有人在参议会门上贴了一副上联用褪了色的红色旧纸、下联用白纸写的自编对联：“参糠参秕参不出一一点好事，议吃议喝议出了二十（个）坏人”。可见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参议会的不满。

黄迪栋知栾川地方情况复杂，李、任两派矛盾极深，在下达任子久回任栾川区长的委任同时，将李腾蛟、任子久共同召至卢氏。在合作金库，由三青团干事长麻志异、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薛湛然（均卢氏豪绅）和已调任合作金库主任

的雷敬典共冈从中调和。二人口头允诺“和衷共济”，实际各怀鬼胎。任子久一九三八年秋回栾川任区长，曾参与筹办耕莘中学，兼任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常志箴）不久，卢氏县长改任李万里，来栾视察，嘉许二区教育事业。任子久想弃政从教，两次呈请辞去区长职务。卢氏县府准其所请，改任区员常乐煦为二区区长。

常乐煦字春亭，颇有才能，且为常姓大族支持，为专员欧阳珍赏识，背有靠山。他于一九三八年开始即连任区员，熟悉情况，有从政经验。一九三九年春调任区长，颇有一些作为。但在一九四〇年被县政抽卢氏朱阳关，为流亡的省政府督修房屋。后又调县府任科员。于一九四四年，被日军残杀于香子坪。

常乐煦调走后，卢氏县府委任毕绩轩接任区长。毕曾久在外地当过县府科长，亦有能力，在地方无派别，为人直爽，办事尚属公道。

一九四二年，区公所改为区署。下设民、财、建、教等组织，办事人员称指导员。区署内还附设警察所，有所长、警长、警察共十余人，维持社会治安。

改署后，将十一个联保合并为四镇。即：栾川、三官庙、赤土店联保合并为栾川镇。

大王庙、陶湾、叫河联保合并为陶湾镇。

三川、冷水联保合并为三川镇。

柳树坑、北凹、庙子联保合并为定远镇。

镇设镇公所。有镇长、副镇长、民团大队附、民政、经济、文化、户籍、警卫等股（或组）。各股（组）设主任、干事各一人。

改区署后，任子久复任二区区长。对刷新政治、改变作

风，作了一些努力，在县政总比赛时，颇得好评。后因迷恋女色，屡受指责，于一九四五年夏辞职。在栾川地下党活动下，符元亮接任区长。到职后即裁汰区丁。减轻群众负担。但仅仅两个月，卢氏县府即下令撤销栾川区署，各镇直属卢氏县府管辖。

同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但内战又将爆发。内乡自卫团司令刘顾三等组织联防区，派军队驻栾川。为了便于供应其粮秣，和卢氏县府商定，恢复栾川区署。卢氏县府委张克宽（栗亭）为区长。至一九四七年秋栾川解放，国民党区政从此结束。

注：本文曾由赵西华、孙光裕二位先生进行校正补充，
在此一并致谢。——编者

“党政处”在嵩栾一带 活动的片断回忆

段海山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大举进犯中原。蒋介石驻守叶县的所谓名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溃败西逃，在原内乡县西峡口镇（今西峡县）收集残兵败将，重整旗鼓，企图在伏牛山腹地，列阵再战。因为他在溃逃时，有些散兵到处骚扰，被地方团队收缴了枪支，他认为，“民众不轨，共党扰乱”，决心加强“政治统治”，才在他的副司令长官部增设一个“党政处”，也叫“党政总队”。

人员拼凑

一、从第五战区调来刘培初任处长。刘：湖北恩施人，少将级挂的中将衔。据说：曾在大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当过高级干事。他带来七个人。梁铭芳、陈传鑫是骨干，余为司务长及勤杂人员。

二、从“中央青年训导团鲁苏豫皖边区分团”（简称“青训团”实际是集中营，原在叶县后撤到镇平）。抽出“结业学员”、即政治犯三十六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批

人在刘培初心目中，既是敌人又是骨干力量，在监视中利用。

三、从汤恩伯的副司令长官部在叶县设立的“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简称“边院”调来学生一百一十余人。这批人本来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但刘培初把他们当作一般人员使用。

以上三批人共一百五十余人，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底在西峡镇北五里桥小学集中训练后，开往嵩县、卢氏一带活动。六月以后，陆续增加的人员中有吸收地方的知识青年，有“青训团”继续介绍的结业人犯，有从汤恩伯的“豫东工作队”（包括“豫西工作队”）调来的人员。当时，“边院”学生偷跑三十多人，“党政处”总共有一百六十人。

七天训练

汤恩伯急于挽回败局，巩固新的阵地，临时把两种相互敌对的政治思想体系的人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以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训练方法非常简单。刘培初说：“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给你们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行动领导’”。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的训练科目是：

第一节，劳动。早上五点半起床，分头帮助当地农民干活。但群众对十三军恨之人骨，看见穿黄军装的都怒目而视，趋而避之。所以第一天第一节课是大家空跑一个早晨，谁也没干上活。给群众搭上腔说句话也是极个别人。当时群众正值插秧割麦季节，第二天早上刘培福亲自带领一百多人走到地头，没人理睬，他也不问，跳进秧田就动手插秧，他是潮

北人，插秧技术很高，又快又准，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在群众不大反对的情况下，他喊着让我们下田跟着干，就这样把我们分批送到各块田里，算是“行动领导”的成功。

第二节，写作讨论。第一天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党所谓的党派性的哲学基础？”这一天大都交白卷。第二天的题目是：“试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孰优孰劣？”这一天还有不少人交白卷，交卷的所写内容也都重复：“中国国情是大贫、小贫，患寡而不患不均，不需要共产。三民主义平均地权，才符合中国国情”等一套陈词滥调。也有几个人秉笔直书，说共产主义有完整的哲学基础，三民主义没有完整的哲学根据，不符合中国国情。晚上讨论时候，斗争很激烈，从“青训团”来的张超然（南召县人）、王省身（方城县人）两人发表违心之论，说：“三民主义的哲学体系是‘唯生论’。唯生史观，三民主义，是完整的一套，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洪禹（东北人，假名）乔敏（上海人，假名）两人大胆发言说：“唯物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是完整的哲学体系，全部《总理遗教》找不出‘唯生’这个词。与其说唯生论、唯生史观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倒不如说是陈立夫、陈果夫二先生为反对共产主义而强把‘唯生’两个字凑在一起，捏造一个‘唯生论’、‘唯生史观’”。双方争执不休。刘培初骂洪禹、乔敏说：“不准你们这样说，不准你们胡说八道，照你们这样说，不是把三民主义搞垮了吗？真混蛋！不讨论了。开娱乐晚会。唱歌、唱戏、讲故事都可以！”稀稀拉拉的掌声过后，“边院”来的学生一致要求：“刘处长唱一个！刘处长唱一个！”刘培初说：“我什么歌也不会唱，只会唱《国际歌》”。他的歌喉虽然不好，音节